

目录学讲义

(初稿)

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讲义》编写组编

(内部参考)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

1962年5月

广东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学业余大学翻印

前 言

《目录学讲义》(初稿)系由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教师赵琦、朱天俊、孟昭晋和彭斐章、王文杰五位同志，用了半年时间编写成的。

本讲义(初稿)是供本科生和函授生学习目录学课程使用的。在体例和内容方面，既考虑到目录学课程本身内容的完整性，也照顾到图书馆学系教学计划内相关课程的分工配合；较多地注意了培养图书馆干部的要求。因此，它不完全适合一般读者学习目录学的需要。

本讲义(初稿)是采取小组集体讨论和个人分头执笔的方式进行编写的。各章写成后，还进行了讨论、修改；最后并作总纂工作。具体分工情况是：彭斐章(七、八章)、王文杰(六、九章)、孟昭晋(三、五章)、朱天俊(一、二、四章；并担任总纂工作)。

在编写本讲义(初稿)过程中，我们除吸取了两校原有目录学讲义、讲稿的精华部分外，还分析研究了一些现有的书本资料；有目的地到北京市图书馆和有关单位，进行了重要参观、访问。凡讲义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编写组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取得了一致意见；有些尚没有完全统一；有些限于水平和时间，至今认识得还很肤浅，有待进一步进行专题研究。

最后，我们向参加北京、武汉、沈阳地区讨论本讲义(初稿)纲要座谈会的同志、但审阅本讲义(初稿)的有关单位和专家，致以深切的谢意。他们有意的意见，给与我们工作很大的帮助。在他们所提意见中，大部分已经吸收；但也有些，因为教学急需付印此稿，限于时间，只能待日后再解决。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方面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一并修改。

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 图书馆学系《目录学讲义》编写组

一九六二年四月

目 次

第一编

第一章	目录学的对象与原则	1
第一节	目录学的对象与内容	1
第二节	目录学的党性原则	4
第二章	认识图书与揭示图书	9
第一节	认识图书	9
第二节	揭示图书	14
第三节	编排图书	18
第三章	书目、索引的种类与作用	20
第一节	书目、索引的种类	20
第二节	书目、索引的形式	25
第三节	书目、索引的社会作用	27

第二编

第四章	中国古代目录事业概略	31
第一节	汉代的目录事业	3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的目录事业	33
第三节	唐、宋、元时期的目录事业	36
第四节	明清两代的目录事业	41
第五章	中国近代、现代目录事业的发展	46
第一节	1840—1919年的目录事业	46
第二节	1919—1927年的目录事业	51
第三节	1927—1949年的目录事业	55
第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录事业	62
第一节	国家登记书目工作	64
第二节	集中编目工作	69
第三节	联合目录工作	73
第四节	图书馆内的书目工作	80

第一编

第一章 目錄学的对象与原则

第一节 目录学的对象与内容

一、目录学的对象

在遥远的古代，伴着文字的出现，产生了图书。图书记载着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知识和思想。社会不断的发展，人类活动的多样化，致使图书内容日趋复杂。一方面人们在变革现实中需要借助于更多的图书，获得多种的知识；另一方面，图书的日渐增多，愈益使人们在书海中选择自己需要的图书变得困难起来。从各个方面，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种问题，并逐渐形成了若干理论体系；目录学就是其中的一种。

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是：研究社会生活中记录图书的关系的一般规律。具体说，就是研究如何根据社会需要，通过查明、揭示、评述与记载图书的方法，使人们借以认识、熟悉掌握与利用图书，从而有助于正确理解图书中所记载的思想和经验，有分析的利用其中有用的知识。

由于目录学研究的领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而，就其性质说，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

目录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学说，应该始终贯穿在全部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

目录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主要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关于如何认识、揭示图书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图书的社会作用，图书类型的划分、认识图书的方法，图书著录、提要、摘要和书评诸问题的研究。一是关于如何通报、利用图书的研究；属于这方面的有：书目、索引的编制，书目评论与宣传，查考文献的方法，书目参考工具的组织与利用诸问题的研究。

研究认识、揭示图书的目的是为了通报、利用图书；而要有效地通报、利用图书也必须以认识、揭示图书为条件。这两

方面的内容是紧密联系的。

具体分析我国历史上各时代目录学思潮及其根源，深讨历代著名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他们记录图书的经验及对其所编书目的评价；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目录事业发展特点、主要成就及其组织原理是目录学史研究的课题。

结合各门学科图书的特点，研究如何记录与利用各科图书的原则和方法，这已形成各专科目录学。如，文艺书籍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等。

各专科目录学是目录学的分支，它们对相应的各门科学来说，是辅助性的学科。一方面，它们对各门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各门科学的发展而日益丰富着自己的内容。

中国目录学在公元前一世纪已产生了。因为当时《别录》、《七略》的出现，反映了人们记录与利用图书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而且初步系统化起来。不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目录学与校讎学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清代乾嘉以前，广义的校讎学^①内通常总是包含着目录学的内容。视目录学为一门学问的提法，最早见于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著的《十七史商榷》一书内；书中写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间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②这是中国目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现象，认清这些，对于研究目录学是极为必要的。

在西方，“目录学”一词发生于古希腊；最初的含义为“书的抄写”（biblion—书，grapho—写）。久而久之，目录学被理解为“图书的记载”。在历史上不同的时代，目录学有着不同的内容，曾经发生过相当的变化。例如，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期，目录学首先被人们理解为一切知识门类图书的历史。

^① 据胡朴安、胡道静所著《校讎学》（1931年）一书内所说，“校讎学者治书之学也。自狭义言之，则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谓之校讎。此刘向之义也²。自广义言之，则蒐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谬误，釐次部类，暨于装璜保存，举凡一切治书事业，均在校讎学范围之内。”

^② 见《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第 1 页。

在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多数目录学家又认为目录学只是研究书目编制的方法。

至今，目录学仍为各派人物解释得各不相同。人们对目录学的了解还是很不一致的。例如，有一派意见，认为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目录编制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科学。”^① 视目录是目录学的对象。另一派意见，则主张目录学研究对象是图书。下面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他们认为，“目录学的对象简单的说，是书，详言之，则关于书的材料、书的形式、书的内容皆是。”^②

我们认为，这两派意见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也都具有较明显的片面性。譬如，第一派意见认为目录是目录学研究对象，只说明了解图书馆与利用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按这种观点，目录学研究领域比较狭窄，而且最终未能说明目录学研究内容的本质。第二派意见认为图书是目录学研究对象，又失之笼统。按这种观点，又把目录学范围扩展得太广泛了，实际上却没有能揭示出目录学特有的内容。

关于从理论上正确地说明目录学对象、内容，无论是国内，抑或是国外，均仍在探讨中。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当前生动的实际工作出发，吸取各派意见中合理成分，尽快地对目录学作出科学的解释。

二、目录学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

目录学和思想史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只有从思想史高度来审阅图书，才能深刻地揭示图书内容的思想倾向，学术源流，确定科学价值，从而达到正确记录和充分利用社会图书财富的目的。

目录学和科学史、图书史的关系也特别紧密，因为研究图书总不能脱离图书中所反映的科学内容，借助于科学史知识，就有可能认识各学种重要著作，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正确估价一书的得失。而图书史是研究图书在各个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作用，图书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的。掌握图书史，

^① 见“目录学”辞条《辞海试行本》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1961年 第7分册第62页。

^② 见《中国目录学大纲》容肇祖编 1934年油印本第3页。

就可以更好地从历史上考察图书，有助于记录图书，促进图书的利用。

目录也常常需要利用史科学的知识，来批判分析史料性质的图书，确定其来源、阶级倾向性、材料可靠程度、实际价值及用途等。

目录学在比勘篇幅文字，辨别图书真伪，鉴别版本源流等方面，又常常借助于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知识。

目录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现时，图书馆工作中应用目录学知识最多。目录学和图书馆学之间出现有若干交叉现象。研究目录学的人们有必要尽可能地了解一些图书馆学的知识。

第二节 目录学的党性原则

目录学的党性是目录学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与目录学的科学性、现实性两原则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目录学是研究记录图书和利用图书的关系的，它所研究与概括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目录学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为，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与政治、理论与阶级利益及政党的利益、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非党的、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的。

目录学的党性原则也是从目录事业具有阶级性这一客观事实所概括出来的科学的结论。校书、编纂目录，中国历代封建皇朝从来就视为文教工作的一部分；在目录中揭示与编排图书时，又总是联系并宣扬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例如，汉代的《七略》，就是一种官修目录，刘向刘歆等对图书内容的揭示、对图书作者的介绍、对学术源流的阐述，无一不是在儒家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七略》中图书的编排体系最有力地贯彻了当时政府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崇儒术，以及实行思想统治的文教政策。近代各派政治代表人物往往也利用编辑的节目宣传图书，为其政治斗争服务。例如十九世纪末，康有为编辑的《日本节目志》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社会政治、科学技术书籍；梁启超编辑的《西学节目表》宣传了当时新翻译出版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自然科学、工农业技术著作，其目的总是为

其进行的改良主义政治活动服务的。

在现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目录事业具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目录事业促进着科学文化的发展，紧密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相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与此相反，目录事业常常被资产阶级用来传播反动思想体系，阻碍着先进科学思想的发展，在书目中充溢着迷信，符咒妖术、鬼神等主题，反映了资产阶级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没落。特别在美国，反动统治集团运用书目宣扬鼓吹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图书，搜集不发达国家情报资料，借以推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

由此可见，指导目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则，就是党性原则。

一、列宁奠定了目录学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基础

伟大的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活动中给我们遗留下不少有关目录学的宝贵遗产，他对书目评论的见解，他亲自编制的书目以及他在 1920 年为当时苏俄所签署有关组织书目工作的指令，给予我们如何选定图书、宣传图书、评述书目、编制书目、组织书目工作等方面，提供了具有极重大意义的指导原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写的一篇书目评论和编的一部参考书目，因为，我们可以由此找到列宁有关无产阶级目录学党性原则的直接指示。

这篇书目评论就是，列宁对尼·亚·鲁巴金《书林概述》第二版第二卷的书评。^① 在这篇书评中，列宁揭露了资产阶级目录学家评述图书折衷主义的虚伪性，提出并论证了对目录学的党性原则的要求。

《书林概述》的编者鲁巴金（1862—1946 年）是一位著名的俄国教育活动家、图书馆学家。他所编的这部书目第一版出版于 1906 年，第二版是在 1911—1915 年分三卷出版的。书中搜集了将近一万六千册书籍、论文集、杂志等，其中以俄文为主，也有少数乌克兰文和外文资料。

《书林概述》这部书目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从科学思

^①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20 卷第 254—257 页

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方面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的尝试。”正由于编者提出了从思想史的高度来评述俄国图书财富，因此，在每类之首先写一绪论，评述该类图书的主题及其思想派别，然后再列举该类图书。列宁肯定了编者的这项优点，指出，“事实上，除了从思想史方面来写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合理的对‘俄国图书财富作一概述’并为自学和图书馆供一部‘参考资料’”。他继续写道，“这里需要的正是对每个部门写‘绪论’（作者写了这种绪论），对研究对象作总述和对每种思潮作精确的说明，然后再按这个部门和每种思潮列出参考书目”。但是，编者的折衷主义观点，阻碍了他的上述意图得以实现。鲁巴金声称他“一生从不参加任何论战，并且认为，在绝大多数的场合，论战都是利用人的各种感情来模糊真理的一种最好手段”。列宁着重反驳说，“第一，没‘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第二，作者忘记了，他是想对‘思想史’作概述，而思想史就是更著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众所皆知，在思想斗争中，人们总不可避免的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支持或反对这种或那种观点。鲁巴金逃避或拒绝论战，只不过暴露了他自己“超阶级”、“无党派性”的真面目，在它的后面掩盖着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列宁仔细分析了《书林概述》中对图书评述与编排的基本态度，以具体的事例，揭露了鲁巴金实际上是用了“最坏的可能形式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

列宁的这篇书评，对于目录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在这里教导我们，揭示社会图书财富必须与思想斗争史联系起来，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从事图书的评述与介绍。

后来，列宁又运用了自己目录学党性原则的卓越见解，编制了一部通常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参考书目》作为附录附于《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后面，使正文和参考书目相互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

这部书目分两部分：第一部份是按著作发表年代顺序的方法，著录与推荐了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著作。以便让读者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每一著作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的联系，以及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从而，能更好地了解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情况。第二部分，是按著作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派别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与评述了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便让读者能从马克思学说的各个方面，辨别各种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从而，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性、革命性。

在这部《参考书目》中，列宁从对著作的选择、著录、提要、编排等方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抨击了各式各样反马克思主义著作；把评述图书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学说、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现实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使我们透过书目，可以清晰地看到，“1914年以前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展开的一幅思想斗争的图画”。^①

这部《参考书目》，对于目录学也有着巨大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对于《书林概述》的《书评》，列宁从理论上论证了目录学的党性原则；那么，《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的《参考书目》部分，就成了具体贯彻目录学党性原则无可比拟的典范。

总之，列宁所编写的这两篇有关目录学的著作，不仅奠定了目录学党性原则的基础，而且也是最完满地体现了目录学高度科学性和现实性的要求。使我们认识到，记载图书必须有、事实上也必然有鲜明的目的性和阶级倾向性，评述图书必须从思想史高度来剖析内容。除此之外，是无法正确地揭示社会图书财富，让人们充分地利用的。

二、对资产阶级目录学“超阶级”思想的批判

资产阶级目录学家千方百计的回避或否认目录学的阶级性。这种观点最集中地反映在对“目录”的看法上。他们把图书目录比喻商店的货物目录，认为“书自书之目也，犹年之有谱，谱之有录”。目录的功用“惟便检查，于学术源流，文章派别，无所与焉”。提出，“目录学者图书簿记之法也”。声称“历

①

见《普通目录学》(苏)B.H. 捷尼西叶夫著 1954年俄文版第18页。

来自目录学之误有三”，其一即是“传统观念阶级思想之深也”。这种说法的实质，就是把目录似乎说成是单纯记载图书的清册，它只不过是检查图书的工具。他们不赞成目录中对图书内容的鉴别，否认目录的政治思想倾向。

这种观点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目录学“独创”的理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目录学家福开森在《目录学概论》中就明白写道，“目录只叙述书本，而不干涉书的内容。”“书的内容或好或坏或平淡都与目录学家无关”。他极力反对“把目录学当成一种同政治一样枯燥的学问”。其用意就是掩饰目录学的强烈的阶级倾向性。这种说法，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造阶级”理论在目录学领域内的反映。

目录是不是仅仅是反映图书供人检阅图书的工具呢？如前所述，无数的事例表明，隐藏在目录作为检阅图书工具之后的是编制目录的目的性和编者对这种或那种图书的态度。目录反映图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宣传一定思想内容图书的手段。目录的编成及其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就会促进或阻碍某种思想观点发生影响。归根到底，目录的出现、流传也是一种思想斗争现象的反映。例如，胡适在1923年首编辑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究其编制目的和内容，不难看出，这个书目是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掩饰下，从1919年就开始了的欺骗青年的“整理国故”活动的一部分；是他竭力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阴谋，是他向封建文化妥协、向新文化运动进攻的工具。由此可见，目录的特点正是通过系统地记载图书，供人检索参考之用来实现它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目录学家宣扬目录“造阶级”的观点，表明他们抓住表面的现象来模糊目录的本质。这种理论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理论。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学者所表述的目录“造阶级”的观点，集中反映了他们所持的目录学“无党性”的基本思想；列宁通过评论节目和编辑书目的活动，却十分强调了目录学的党性。一反一正是多么鲜明。正确的当然不是资产阶级学者，而是伟大的列宁。让我们用目录学党性原则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首先，在认识图书时，要看到图书深刻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揭示社会图书财富，要注意与思想斗争史联系起来。这

样才可能对书中的思想观点及阶级倾向性，给与深刻的说明。同时，还要密切地联系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的研究最新的成就，来向读者介绍图书内容，正确估价图书的价值。这样，才能宣传先进思想和经验，揭露反动思潮和过时的观点。

第二，在编制书目时，从选择主题，著录图书、编写提要，直至编排图书等方面，都需要有高度的思想性、鲜明的目的性和现实性，使之在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宣传图书，提供文献资料的作用。在分析书目时，不仅看编者的编制目的，同时还要看它实际的效果。

第三，在评价某一时期目录事业的现象时，也要有阶级观点和科学标准。既要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学术思想，也要对这一时期主要目录家及其活动的社会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章、认识图书与揭示图书

第一节、认识图书

揭示图书是以认识图书为条件的，图书是以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重要工具，是人类社会生活所借以进步的知识宝库。没有它，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发达。

图书既是一种传播知识的工具，也是一种具有物质形态的工艺品。从一定的图书可以认识一定的时代；而一定的图书出现后，对社会发展又有一定的影响。

因而，认识图书就要认识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就其内容说，图书早在印刷术发明前，就是反映社会意识的重要因素。印刷术的采用，更加提高了图书的社会职能。各种社会思想、新与旧的斗争，科学和技术的发现，都能够借助于图书获得广泛的和迅速的传播。在阶级社会中，图书就其思想内容说是有阶级性的。就其形式说，各个历史时代，各个民族也是有所不同的。以我国为例，远古有过甲骨书、青铜书、石头的书、竹木的书、帛书。秦发明后，特别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发明、铅印术的传入，书籍制度又一步步地进入新的阶段。现在又出

现了一种缩摄图书。

一、图书的基本类型及其划分的意义

图书按其特有的用途可分为：指导性的文献、学术论著、教科书和教材、通俗读物（包括科学技术通俗著述、社会政治理论通俗读物、文化普及读物、连环图画等）、儿童读物（包括专为儿童写的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科学故事、历史文学读物，游记、笑话、儿童歌谣、儿童诗、儿童剧本、图画故事等），文艺作品，特种科技资料（包括专利文献，规格标准、产品目录、科技报告等）、资料汇编（该类型中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较多）、连续出版物（分定期与不定期两种）和工具书。

图书按其外部形制可分为：手稿、钞本、印刷品、缩摄图书（包括显微影片、显微胶片、显微卡片、显微印刷品）。

各种图书类型都是相对而言的，如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图书在现实生活中也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就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图书的类型。

划分图书类型在认识图书中的作用，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1.便于掌握图书的来源；2.明确图书的读者对象；3.可以据其特点鉴别揭示图书；4.提供合理编排图书与迅速检索图书的可能性。

二、鉴别图书的原则。

鉴别图书要从分析图书内容和研究图书形式两方面入手。

分析图书内容时，要考察图书内容的主题思想。弄清作者以怎样的观点根据，提出与解决了书中所提出的什么样的问题。要注意到图书内容的政治思想性、科学价值、现实意义。

考查现实的自然科学技术图书时，要注意其内容是反映了先进科学技术呢，还是落后于时代，沿袭旧观点。考查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时，尤其要特别注意，其内容是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观察事物的指导思想，认清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使用价值。

研究图书形式，要考查图书的版本源流。检查图书的印刷装帧是否坚固、美观、符合图书内容的要求。要注意图书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形式的统一。

在研究图书的内容和形式时，要特别注意紧密地联系图书的用途和读者对象。

对于各类型图书的研究，还要注意掌握各自鉴别的基本要点：

研究指导性文献在于抓住这些文献写作公布的时间及其时代背景，提出与解决了哪些革命与建设中的问题，具有什么指导意义。

研究学术论著应着重注意书中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作出了什么结论，深入到何种程度，比之该问题前人研究有哪些进展，它的现实意义怎样，在该门学科发展上具有怎样的地位。

研究教科书和教材应着重从读者对象考虑，分析书中是否系统地反映了经过仔细选择和审查的，最基本的材料，是否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反映了国内外有关该门学科的科学的研究成果。书中内容是否注意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思想教育任务。

研究通俗读物是否注意到既普及了政治理论、文化科学知识，又使读者认识到科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阔的发展前途。是否让读者既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在表达方式上是否简洁、生动有趣；使深奥的理论或科学问题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研究儿童读物应注意内容是否富有教育意义和丰富的故事性，书中的人物形象是否鲜明、生动。读物的结构是否简洁，语言是否明快、正确。

研究文艺作品要注意作品内容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性、社会意义及其教育作用。研究作者特有的创作风格及文艺技巧的特点。

研究特种科技资料和资料汇编时，需要注意各自反映资料的范围与时间，编排体系和特点以及相应的辅助性资料如书目、索引等编辑出版的情况。

研究工具书必须着重考查具体的用途，其中所收材料的完备程度，观点是否正确，阐述是否科学，编排是否简明易查。

三、认识图书的方法

认识图书的基本方法是阅读，阅读分为一般浏览与重点精

读。认识图书的另一种辅助的方法是依据图书本身直接提供的资料查阅图书，利用书评和书目熟识图书，参考读者对图书的意见而获得图书的知识。

依据图书本身直接提供的资料查阅图书，首先是从著录事项，如著者、书名、出版等项着手；也可参考序言、跋、目次及出版提要。由此所得图书知识虽然不够深刻，但熟悉大量图书比较迅速有效。

书名是一部书的名称，不少图书只要知其书名，就可以大致了解其图书的性质和所属类别。例如，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就知其是历史书籍。

有一些书名，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它的措词和命题须经过一定的解释，方能明白。例如，俄国普列汉诺夫写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是阐述唯物史观的一部杰作。我们知道一元论有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和唯心主义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所以这样含糊其词，是由于想避免俄国沙皇书籍检查机关的检查。

只是凭书名去判断图书的类别和内容是不够的，如果只凭书名下结论，往往造成错误。特别是文艺作品内容，很难根据它的名称断定。因此，还应该注意与书名相关的资料。而题下项所给与图书的说明，对于认识图书的特征，往往有很实际的意义。

题下项总是对书名作补充的解释，或者补充图书的含义，例如，赵自写的《最后的斗争》（《不死的王孝和》里的故事），或者表示内容性质或著作体裁，例如，姚仲明，陈波儿等集体创作的《同志，你走错了路！》（话剧）；或者指明图书的专门用途，例如，张孝骞等著的《内科学及护理》（护士·助产学校教学参考书）；或者标明读者对象，例如，俞子夷编写的《算术》（小学教师进修用书）。此外，对于报告、演说、宣言等教材发表的时日和地点等，有时也补充说明。这些资料，都提供了认识图书的条件和可能。

在不少情况下，熟悉图书的作者也可有助于判断其性质。熟悉很多中外有名的历史人物、作家，也可以帮助鉴别图书的价值。例如，茅盾写的《子夜》，可从作者断定这是一部有价值的文艺小说。有些书，从译者、编者的情况，也可大致获得

对一本书质量的印象，例如，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是比较得到读者好评的；又如，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从编者就可知这是一部极可信赖的好书。至于近年来大量翻印出版的古籍，一般也可从这些书籍的选辑、重编校订、注解的姓氏上去判断质量。然而，我们也常常会见到一些不著名的作者、编者、译者，不能就此低估作品的质量，应该更加慎重，直接分析研究或直接利用书评资料来审查和研究图书内容，确定一书的价值。

有关图书出版的记录，也是熟悉图书的必要资料。现代出版的图书，通常印有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和版次、版刻等方面的情况。

图书出版年是出版记录中最重要的资料。因为出版年代常常可能反映着图书内容的观点新旧或陈旧程度怎样。考查出版年代远近，对于不同内容的书籍具有不同的意义。凡是当前政治运动的宣传性的出版物，供学生使用的教材以及地图等，愈是最近出版的，现实使用价值就愈大。

图书的出版者，也都明显地表示出各自特点。在解放前各出版社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例如，正中书店所出版的书，大部分都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服务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一般说来是比较进步的书刊。解放初期，在私营出版社未整顿前，京沪地区私营书店，大都以营利为目的，粗制滥造，质量很差。目前，在出版社作了专业分工后，只要知其一书的出版社，通常也就可能大致了解一书的类别和性质。

图书的版次标识着它的内容的修正或增补。凡是修订本或增补本对于前一版来说，必然具有一定改进。有些书竟因为新本出来旧版就没有多大使用价值了。

阅读序言也是我们认识图书的门径。因为序言里，作者、编者或译者揭示了一书的主要内容或编著译述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序言尤其重要。例如，《共产党宣言》书前的各篇序言，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是有很大益处的。在一些学术论著或编印的古籍中，除去序言外，阅读一下附录也很有益，因为附录中从各个方面提供有关这部书的资料。

目次是图书内容的纲要，浏览目次，就可能使我们更进一

步了解一部图书的内容范围。而涉猎一下书名页背面上由出版社编写的内容提要，这更是认识图书最常用简便方法。

然而，认识图书仅仅依靠直接查阅图书本身所提供的资料是不够的，因为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深入地了解图书内容，以便作出确切的评价。因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书评和书目来达到更为深刻认识图书的目的。

这可从经常留心报刊上学术动态与书刊评介，注意翻阅各种书目着手。事实表明，要认识一部书所阐述的主要问题，就必须深入分析书的内容。而这样的资料，只有从专家编写的书评或质量较高的书目中才能得到。

利用书评或书目认识图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查阅书评、书目，然后去查阅图书；一种是直接分析了原书上所能提供的资料以后，再借助于书评、书目来检验和补充自己的意见。把阅读书评、书目后的心得，经常有系统地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就可丰富自己关于书籍的知识，熟悉大量图书，提高独立评介图书的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利用这类资料，目的要明确，选择要得当，进行时又要持之以恒，这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读者对图书的意见，这可从经常与读者的接触和图书馆群众性宣传图书的活动中注意搜集，分析同一图书在读者中不同的领会与评价，了解图书对读者的具体帮助，从而得知图书的社会影响。由此所得图书印象，可以把图书的一般知识与图书在读者中的影响联系起来，使我们有关图书的知识更为全面、完整。

在认识图书过程中应注意上述诸方法结合使用。这些方法虽然可以解决在较少时间内熟悉大量图书的问题，但它们绝不能完全代替平时阅读图书。阅读永远是深入认识图书最基本、最可靠的方式。

第二节、揭示图书

揭示图书就是准确的向读者报导图书、揭示图书内容，评述图书内容的思想性和科学价值。揭示图书的方法，最简略的只是揭示书名、著者和出版事项，有时则是或详或略的说明图